

# 「郁達夫和王映霞」

## 舊案新探

(本文插圖刊第3、127、128、129頁)

·劉心皇·李遠榮

### 李遠榮的三個看法

關於郁達夫和王映霞的愛情故事，流傳了幾十年，海內外文人墨客也為此寫了幾百篇的文章，對「郁王之戀」從熱戀到分手，都發表了不少意見。

郁達夫有妻室孫荃，却再狂追心目中的維納斯女神——王映霞，這一做法，除了他的父兄反對之外，也受到了外界的不少壓力。

後來「郁王離婚」，更是眾說紛紛，但歸納起來有三種看法：

- 一、同情郁達夫的遭遇，批評王映霞，所謂「移情別戀」。
- 二、同情王映霞的不幸，批評郁達夫浪蕩不羈的行爲。
- 三、雙方都指責，指出各人不對之處。

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，爭論了幾十年，仍然沒有結果，可說：「清官難斷家務事。」

如果郁達夫不是中國著名文人，這只能算是一件普通的離婚案，人們的興趣也不會這樣濃厚。正因為郁達夫是海內外知名的文人，所以這件

「離婚案」提高到社會的道德觀念標準來衡量，從滄海之一粟，去解剖社會，可窺全貌。

香港作家李遠榮和臺灣作家劉心皇，以及居住上海的王映霞時常有書信聯繫，並深入探討「郁達夫和王映霞」的種種問題。儘管他們在探討中意見分歧，但却能暢所欲言，打開了郁王論爭的新課題，這些爭論是十分有益和有建設性的。

爲了使海峽兩岸的讀者進一步了解「郁王離異」的真象，他們願意把部份信件公諸於衆，讓大家去分析。

李遠榮對外傳「郁王離異」的三個原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，爲此，他寫了一封信給劉心皇，闡述了自己的觀點，信是這樣寫的：

#### 男人主義腐朽生活

「心皇兄：前信提過日後有時間，我會和你探討一下郁達夫和王映霞的幾個問題。今天剛好有空，我想談談自己的看法。

這幾年來，我看了幾本有關郁王愛情悲劇的書，覺得其內容大多是「褒郁貶王」。郁達夫是公認的文學巨匠，這點無可置疑。但其腐朽的生活作風，我是不敢恭維的。

已公開的，他娶過三任妻子，分別是孫荃、王映霞、何麗有，還有一位同居情人李筱英。至於嫖妓宿娼，可以說不計其數，在他的「日記九種」中，也有關於嫖妓的描寫。

但史評家對這種花天酒地的糜爛生活，不但不批評，反而贊其文士風流，似乎玩女人是男人的專利。

而王映霞從來未聽說過有桃色新聞，後來因與許紹棣關係密切一點就鬧得滿城風雨，且被達夫所責，一時怪她『水性楊花』，一時責其『紅杏出牆』。男人和女人都是人，而且一樣地幹那件事，但社會的輿論往往偏袒男士，指責女士，這是十分不公平的。

俗語說：『捉姦在床』。王映霞是否有出軌的行爲，也是憑人們的推測，而作出的結論。這種遺留幾千年重男輕女的倫理道德觀念，是應該改變的時候了。

並非王映霞是我的好朋友，我才爲她說好話，凡事須講證據。

阮玲玉因經不起社會輿論的譴責在『人言可畏』的壓力下自殺身亡。

王映霞能掙扎到今天，也是憑其勇氣，我說她勇氣可嘉。

關於她和許紹棣是否有姦情？直至今日，她仍然至死不承認。

人們猜測她和許紹棣的姦情，所謂證據，不外有三點：

一、許紹棣寫給她的三封『情書』，被郁達夫發現。

二、她和許紹棣在『麗水同居』。

三、王映霞寫給許紹棣的匿名信被西德漢學家馬漢茂公開登了出來。

以上三點，據王映霞女士解釋，其經過是這樣的：

第一點，關於『三封情書』的問題：

當時名畫家徐悲鴻愛上他的女學生孫多慈，王映霞以為徐悲鴻已有妻女，這段婚姻不會有結果。恰巧當時浙江省教育廳長許紹棣的夫人三年前病逝，許先生有意續弦。於是王映霞就把孫多慈介紹給他，並寄去了孫多慈的近照，許紹棣為此事覆了三封信。平時這三封信是隨便放在寫字

枱上。因為王映霞認為這是極普通的信，故不以為意。但郁王關係惡化後，郁達夫就在這上面大作文章，指為情書，並印發給朋友。

郁達夫和徐悲鴻對此事十分不滿。

王映霞女士還告訴過我：自她和郁達夫辦妥離婚手續，離開新加坡回重慶，認識了鍾賢道，並結婚，同年同月郁達夫和何麗有、許紹棣和孫多慈也舉行婚禮，真是無巧不成書。

第二點，關於『許王麗水同居』之說：

一九三七年冬，王映霞帶三兒一女回逃難到麗水，浙江省教育廳屬下官員也逃到麗水，許紹棣帶了三個女兒隨遷至此，兩家人經常來往。他們的兒女都已懂事，是否同居？他們最清楚。郁達夫之長子郁飛對此事是完全否定的。

至於第三點，匿名信的問題，最簡單。我對照了王映霞女士的筆迹，可以肯定的回答，那兩封寫給許紹棣的匿名情書絕對不是王映霞寫的。當事人郁達夫和王映霞，前者已作古，後者尚健在。死無對證，誰是誰非，我們也不能單聽一面之詞。我只能擺出事實，供閣下鑒別參考。

對這些發生在幾十年前的事，王映霞女士也不大計較了，她送我一幀墨寶寫道：

『夕陽無限好，惜是近黃昏。』

她現在有一個幸福的晚年，兒孫繞膝，過着安詳恬靜的生活。

以上是我粗淺的見解，不知對不對，請指正。祝

新春快樂

弟李遠榮

一九八八年三月二日

美國美人寵作愛妾

「遠榮兄：頃接

大札（一九八八年三月二日），誦讀至再，甚為欣慰。關於複印的郁達夫贈版權的文件，很清晰，很有價值。至謝。

關於郁達夫與王映霞的悲劇。吾兄對郁達夫的批評，我完全同意，我記得我與胡秋原談過，郁達夫本是一個濫文人，但由於他在南洋，被日

軍殺害，而成正果，把他的狂嫖濫賭，濫寫頹廢文章，以及玩弄少女如王映霞小姐者都被掩蓋了而成爲抗日英雄，連他當過日本憲兵翻譯的事也被掩蓋了。所以他的家鄉才爲他樹了紀念碑。

再說，郁達夫對女人（指太太）的觀念，是『我的女人』，他與太太不是平等的，他一再說『我的女人』如何如何？他與荃君，感情很好，他遇王映霞之後，一爲驚艷，一爲她年幼可欺。一直追到王映霞接受他的追求時，條件當然是要他與荃君離婚，他當然應允，其實是假離婚，證之，荃君仍住在家裏，他時時還與她溫存一番，豈不是欺騙了王映霞嗎？

同時，在郁達夫的內心深處，是把王映霞當成愛妾寵愛的。證之他在啓事中說：『妾』如何如何，便知道底蘊了。人是絕對不能脫離時代及環境的，郁達夫所處的時代正是過渡時代的人物，但他的內心深處對女人的觀念，仍是舊時代的。他認爲男人可以三妻四妾，而女人須守貞節。觀乎他處理王映霞與許紹棣之事，可以此作結論。

關於王映霞與許紹棣之事，我認爲是王映霞的報復行爲，不是不義，也無關道德問題。所以我在『郁達夫和王映霞』的書裏，是只想求事實真相而已。我認爲王映霞如有此事，應與西洋人寫『回憶錄』一樣，不必絕口否認。我接到老兄的信後曾訪問郁王的同鄉阮毅成先生（曾與郁王是朋友，曾任浙江民政廳長，也是許紹棣的朋友）。談郁王的事，他說映霞與許的戀情，決非空穴來風。

關於你所說的三封信，郁達夫曾印發友人，並說『映霞失身之夜是在飯店』（『毀家詩記』的註），可惜這三封信，我都沒有看過。老兄能否再設法找到它，如果找到，則是一大功德。

關於『麗水同居』的問題，此一問題，是郁達夫聽到的傳聞之談。依我推想，映霞和許的戀情還沒有到同居的地步。

至於匿名信，是傳自外國，是映霞沒有寫，和寫，都談不到道德問題，所以，此事我以為不重要。

記得我曾說過，郁達夫追王映霞時，在文學界是一大新聞，報紙雜誌，都有渲染的記事。於是王映霞的美艷遠近聞名。追求美是人的天性，許多人想和王映霞接近，是那時代的風氣。

映霞關於情愛方面的傳說，自然是難免的。郁王的這一段戀史，恐怕比他們的文章選出名。映霞從此為民國美人，是不會磨滅的。這一點也可告慰於她了。肅此奉復 卽頌

撰祺

弟劉心皇

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七日

「註」關於郁達夫和王映霞離婚，劉心皇在他寫的書「郁達夫的爱情悲劇」裏面有一章「郁王婚變的批評」寫下這樣一段話：

「老實說：郁王的戀愛一開始便隱含着悲劇的陰影：『日記九種』的出版呈現王映霞的美人胎子於大眾之前，像悲劇演員的亮相；從上海移家到杭州居住和浙江省官僚厮混，便是悲劇的開幕；從郁達夫到福州任福建省政府參議兼公報社主任，把映霞留在杭州家中，便是悲劇的開演；

抗戰開始杭州疏散逃難，到武漢發現許紹棣情書，便是悲劇的高潮；從郁達夫帶映霞到南洋，便是悲劇的曲折；從郁達夫的發表『毀家詩記』便是悲劇的落幕。以這一悲劇的開始到落幕，細細看來，便可知郁王愛情悲劇是怎麼回事了。公平判斷，王映霞和許紹棣通姦固然是大錯，而郁達夫也負有令映霞傷心的責任。」

有離別詩無錢別宴

「心皇兄：

三月十七日函拜讀，老兄言之有理，我獲益匪淺，謝謝。

香港有句俚語云：『文人多大話』，其意思是說寫文章的人愛說謊話。如果是為藝術的完美，誇張一點，說了謊話，那也情有可原。如果因說『大話』而傷害別人，那就有欠公德，你說是嗎？

王映霞與郁達夫協議離婚後，一九四〇年五月她離開新加坡經香港回國。郁達夫在五月二十三日寫下題為『南天酒樓餞別映霞』之律詩。

詩云：

自別銀燈照酒危，旗亭風月惹相思。  
忍拋白首盟山約，來譜黃衫小玉詞。  
南國固多紅豆子，沈園差似習家池。  
山公大醉高陽夜，可是傷春為柳枝？

郁達夫在這首詩裏將依依不捨之情，寫得真切感人。後來這首詩被認為是臨別時贈送王映霞女士的。

但據王映霞女士說，她離開新加坡時，郁達夫並沒有在南天酒樓為她餞別。如果王女士的話

還不足信，那麼當年和郁達夫同事的黃葆芳先生在『回憶郁達夫先生二三事』一文中說：『南天酒樓餞別王映霞』的律詩兩首，如果我的記憶沒有錯，達夫並沒有在映霞離新前夕餞別過她。那晚達夫先生約了胡浪漫、馮列山兩兄和我到白燕社作方城戰，他擬通宵達旦繼續下去，不肯回家，避免與映霞分別的痛苦。可是我們翌日各有工作，不能奉陪，他在無奈之下買瓶白蘭地酒，午夜時分到南天酒樓開房，喝得酩酊大醉。到第二天午後才起床，映霞登船時，他可能還在睡夢之中。

可見有離別詩而無錢別事。為了藝術的完美，這樣說『大話』無可非議。如果不寫王映霞在場，其氣氛會差很多。

在這組『毀家詩記』中，反駁之處甚多，恕不一一舉出了！

郁達夫揀到許紹棣寄給王映霞的三封信，我們都沒看到，只聽郁達夫一面之詞。所謂『王映霞失身之夜』信中是否有描述？可信程度有多少？不得而知。

如果能看到那三封信，將真相大白。順頌

著祺

弟李遠榮

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一日

### 劉心皇論「郁王之戀」

「遠榮兄：三月廿一日大札奉誦至再，認為吾兄在香港研究郁王舊案，頗得地利之便，因為許多書籍不能到臺灣來，評人評事，首重資料和證據，不能憑臆測論人，也不能憑道聽塗說論事

。大札所言：

一、關於郁達夫好暴露自己，往往誇張得令人不能相信，被他誇張得不能忍受的，便是王映霞。關於夜飲南天酒樓贈別王映霞詩，所作考證甚是。此詩雖極富感情，但不是當時所作，不要說郁達夫根本未送王映霞，即真送王映霞，也不是當時所作。——試想當時悲傷，無奈之情，湧上心頭，那是最緊張的關頭，怎能去考慮詩句呢？例如戰爭文學，也不是在戰場上寫的，都是在戰爭結束之後寫的。

又例如男女戀愛的詩文，都是在別後獨處時寫的。當時在情緒緊張、激昂、動感之下，那裏還顧得詩文？郁達夫在王映霞離開之時，正如大札中所說，他以打牌，喝酒來麻醉自己，待他情緒平定之後，痛定思痛，才有那首頗為感人的詩句：

『旗亭風月惹相思，忍拋白首盟山約，南國固多紅豆子，可是傷春為柳枝。』

這種不在當時書寫，是可以理解的。綜觀郁達夫的心情，對王是又愛又恨，又想離又不想離，是非常矛盾的。不像映霞，想起她與達夫結合，而達夫竟未真的和前妻離婚，試想，一個純潔的少女，遭此打擊，是越想越恨。

### 民國才子佳人形象

但在數十年後，恨已消，仍要以達夫的關係，而以『才子佳人』的悲歡離合，筆之於書，又拍了電影。他們以『民國的才子佳人』流傳千古，這樣說來，映霞雖被騙，也還算值得。否則，她雖和門當戶對年紀相若者結合，也不過如草青

了黃了，一輩子，誰知她是老幾？而映霞成爲『民國女子』，或『民國佳人』，有賴於達夫的描寫，和達夫對他們生活的坦白暴露，你說是不是？

二、關於許紹棣的三封信，一直都沒有找到。據說當時郁達夫是用珂羅版印刷送朋友的，得到那三封信的人一定很多，可惜，來臺灣的人都是一九四八年前後倉皇離開大陸的，所以沒有人將它帶出來，想在大陸的人，可能有保存者，如能有此三封信，自可評斷郁達夫所受的刺激，是否『神經過敏』！

吾兄對郁達夫和王映霞的史料，蒐集的很多，因得地理之便，又很正確。和吾兄討論他們的問題，得益良多，特此致謝。肅此頌頌

大祺

劉心皇

一九八八、四、四晚

## 王映霞晚年的追憶

### 夢中尋夢半生苦多

「遠榮先生：昨日傍晚，收到十月十九日信我怎麼可以與鄭板橋寫的竹石詩相比，差遠了。人生如夢，我更是夢中在尋夢。

我的前半生有甜、有苦。但苦太多。我愛面子，結果弄得有苦難言，無人可告。

當年，在杭州的朋友不少，我都坦誠相待，光明磊落，這是我的作風。

許紹棣新喪，爲他介紹一個對象，也是人之常情，豈料僅此一點火種，謠言四起，最後鬧得家破人亡。幸我洒脱，始終覺得做這件事無愧於心，我行我素，所以這條老命才能保留至今。冥

冥之中，豈非有神助。

爲了介紹孫多慈，我給許紹棣寫過三封信，覆信都放在書桌上，這算什麼『情書』？情書竟是這樣的嗎？結果他毀了家，也毀了自己。

郁達夫給我的信，我保留有影印件。今天找出一封較長的送你。

另有一張郁達夫親筆寫的『贈與書』，也有五十多年，同時寄上。

請想一想，我當年的愁與恨。又誰知在這六十年後的今天，居然給你看到，這不是緣份是什麼？

我說過：『夕陽無限好，惜是近黃昏。』在寂寞的餘暉中，亦足以自豪自慰矣。

專此佈達 卽聞

王映霞

寫於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五日

### 六十年前的愛與恨

註：讀了王映霞女士這封信，使我們聯想到最近在香港大會堂十二樓的藝術館，正在舉行的一個別開生面的「徐悲鴻藝術展」，大堂之中有一幅十分顯眼的大油畫，畫中是一位穿高又旗袍的少女，含情脈脈地半倚在一張搖椅上，可謂風華絕代，儀態萬千。她是誰呢？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孫多慈小姐，是徐悲鴻的得意門生。

正是這位孫多慈，引出了三十年代中國文壇巨星郁達夫的一段極爲轟動的愛情悲劇。

話說一九三八年，郁達夫的夫人王映霞因戰亂，合家搬到浙江麗水居住，三月間郁達夫從福建回到麗水，說是將去武昌擔任軍事委員會政治

部第三廳的設計委員。並要把王映霞及孩子接到武昌去。

臨動身的前一天，有一位名叫李立民的人來找郁達夫。這位李先生是浙江省政府秘書，也是郁達夫的老朋友。他來郁家的目的向郁達夫作了表白：原來他妻子早年亡故，膝下有五個女兒，在這戰亂期間，敵機到處轟炸，他連自身都難保，所以無法顧及五個沒有母親的孩子，他想托郁達夫把他的大女兒李家應帶到武昌，郁達夫答應他的要求。

李家應小姐大約有廿七、八歲，是南京中央大學西畫系畢業生，也是名畫家徐悲鴻的學生。

在從麗水坐火車去武昌的途中，李家應和王映霞成了好朋友，在火車上無所不談，在閑談中，李家應告訴王映霞，她在中央大學西畫系的同班好友孫多慈，正被其老師徐悲鴻力追，孫多慈不知所措，正徵求李家應的意見。李家應不贊成這段婚事，她以為徐悲鴻已有妻室，且是留學法國的，孫多慈又不懂法文，只怕婚後會問題多多。所以希望王映霞給孫多慈介紹一位男朋友。

王映霞認為君子成人之美，想了很久，才想到介紹許紹棣給孫多慈認識。李家應也贊成。

到達武昌後，首先李家應送來了孫多慈的相片，托王映霞拿給許紹棣，為此王映霞給許紹棣寫了幾封信，介紹孫多慈的情況，並寄去了照片。許紹棣看了照片及介紹，對孫多慈十分滿意，也給王映霞覆函感謝。三年後許紹棣和孫多慈結婚，有情人終成眷屬。

郁達夫知道王映霞為許紹棣介紹對象，極表

不滿，叫王映霞不要多管閑事，李家應看到郁達夫這樣表態，也不好意思再找王映霞。

一九四一年，徐悲鴻到了新加坡，和在新加坡任「星洲日報」副刊主任的郁達夫相遇，徐悲鴻向他談起對王映霞的不滿，拆散了他們的大好姻緣，而他和郁達夫却惺惺相惜，郁達夫在「題悲鴻畫梅」這首詩中有兩句：

「各記興亡家國恨，悲鴻作畫我題詩。」

句中「各記」的「各」字，是有用意的，是相互珍惜的意思。

至於許紹棣覆王映霞的三封信，在郁王婚姻破裂時，被責為「情書」，為此郁達夫於一九三九年三月在香港陸丹林編輯的「大風旬刊」第三期發表的「毀家詩紀」上有一段詩註：

「七月初，自東戰場回武漢，映霞時時求去。至四日晨，竟席捲所有，匿居不見；我於登報尋找之後，始在屋角撿得遺落×君寄來的情信三封，及洗染未乾之紗衫一襲。長夜不眠，為題「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遺留品。」數字於紗衫，聊以洩憤而已。」

郁達夫還寫詩道：

「寒風陣陣雨蕭蕭，千里行人去路遙；不是有家歸不得，鴉鴉已佔鳳凰巢。」

郁達夫的瘋狂暴露，不但毀了家，也毀了自己，使王映霞女士達到無地自容的地步。

郭沫若先生的話是對的，他說：

「自我暴露，在達夫彷彿是成為一種病態了。別人是「家醜不可外揚」，而他偏偏要外揚，說不定還要發揮他的文學的

想像力，構造出一些莫須有的「家醜」。」

為了澄清事實，王映霞女士曾想找李家應和孫多慈。中國文化大革命後期，王映霞遇到了鍾元先生及其夫人。十分偶然，原來鍾元是王映霞的女兒鍾嘉莉的同學，他夫人的阿姨居然是李家應！可惜李家應已在文化大革命中逝世了。

孫多慈和許紹棣於一九四九年到了臺灣，前幾年兩人先後逝世。

這段舊案，爭論了幾十年，尚無結果，似乎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。

## 和郁達夫生活點滴

### 紅衛兵抄家書遭殃

「遠榮先生：『日記九種及其他』一書收到了，我該如何感謝你對我的關注？翻翻這本書，往事依稀可記。但我不再想它。人要堅強的活着，要快樂的活着，最要緊的是對得住人，才能捫心無愧。」

文化大革命中，我家的藏書全被作為四舊抄走，運動過後，又搬來了一堆書要選我，原來都是別人的，我不肯要。就這樣，我們成了沒有書籍的家庭。

我過去珍貴的底片，也被拿走，也成了「四舊」。現在這些底片是選我了，我將它洗出來，有時自己欣賞一番，也是一種紀念吧！

我現在的個性是除了看書報，聽聽音樂外，沒有其他嗜好。

郁達夫教過我吃烟、吃酒，甚至於看人吃鴉片，但我不愛這一些，依然故我。

這就是我的個性。我晚年的境況不錯，堪以告慰於諸親友。

一切如意！ 王映霞書於

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七日

在家打扮出外樸素

註：王映霞十一月七日之來信涉及到一些郁達夫的生活作風，他嗜酒如命，甚至抽鴉片。

根據王映霞女士的回憶，她說：「郁達夫脾氣古怪，平日不喜歡我打扮，不要我多與朋友交往，不要單獨出門。要我在家里打扮得漂亮點，出去要樸素點。」

郁達夫的文學才華姑且不論，他的生活作風却是我們不敢苟同的。郁達夫是江南才子，瀟灑風流、落拓不羈，「今日有酒今日醉，莫管明日沒柴燒」。有錢時，上館子，吃西餐；沒錢時，啃大餅，吃稀飯，實無以為繼的時候就跑當舖，或向朋友借貸。

一九二八年夏的一天，郁達夫喝醉酒，穿中國式的短衣褲，在上海十六舖碼頭睡覺，身上的東西全被小偷竊走。

這種時富時窮的生活，王映霞是不適應的，這也是造成婚姻破裂的原因之一。

這封信裏還提到「文化大革命」期間，王映霞被抄家，也都是事實。

「文革」開始，她和鍾賢道夫婦遭審查、批鬥，說是有「嚴重政治歷史問題」。

一九六六年八月開始連續三次的「紅衛兵」抄家，所有照片、書籍、字畫、信件全被抄走，房間被貼上封條。在批鬥會上要背誦「毛主席語

錄」、「低頭認罪」。接着是「隔離審查」，無休止地學「最高指示」，寫交待材料，沒完沒了的「認罪」，自我批評。這種折磨持續五年之久。王映霞女士在受審期間還當清潔工、油漆工。可見，十年浩劫，抗害了多少無辜百姓。

麗水同居胡說八道

關於外頭謠傳王映霞和許紹楙曾在「麗水同居」，我會就此寫信訪問過王映霞女士，王女士覆了一封長信回答了這個問題，信是這樣寫的：

「遠榮先生：致李鵬翥先生的一封信及廿八日函並附複印附件兩份，都先後收到，謝謝。

關於來信提到有文章說「王映霞和許紹楙在麗水同居」，這是胡說八道的謠言。

麗水是浙江的一個小縣城。而當年杭州去避難的人沒房子住，正好這時候有一幢「燧昌火柴公司」的房子出租，這房子又大又新，於是浙江省政府，以及民財建教四廳並四廳的職員一部份眷屬，也都借用了這一幢房子，而且連伙食大家也都包給了省府的大灶，我記得很牢，一個月的伙食費是每人每月八元，在飯廳裏吃還是取回家吃都可以。

至於燧昌公司的房子是怎樣的呢？我還記得是五開間、五進、五層樓，是剛建好的一棟新屋，你可以想像，這該有多大，有多少人居住？

我一家有一位老人、三個孩子、一個媳婦。住在這棟房子裏的，不但有許紹楙，還有省主席黃紹竑，財政廳長程遠帆等等。

程遠帆是位熱心的人，他把我們從富陽接到麗水，還為我們安排住進燧昌公司裏。

對於程遠帆，我很感激他。以後他在政治上失意，到重慶後擬返上海，又買不到渝浙的機票，便來找我，我因為在特檢處工作過，航檢所的人認識很多，通過上面，為他弄到了機票，使他順利返上海，他是很感激我的。這事很少人知道，連當時的胡健中也不明白內中原因。我是重義氣的人，知者必答。

我對朋友既熱心又真摯。這是我相處或通過信的人約略都可以看出。我是：

書有未曾經我讀，事無不可對人言。

新加坡的黃葆芳先生當年和我們很熟，他寫的文章都是事實。還有胡浪漫寫過一次信給我，他說：「冰凍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」。

我和郁達夫的分歧點，並非一朝一夕之事。兩個人的教養各異，這是大癥結。

好了，暫寫到這裏。

安好！

王映霞

一九八八年七月三日

親愛的讀者，上述是李遠榮、劉心皇、王映霞通信的情況，儘管他們的見解有分歧，但他們都本着探討問題的誠意，擺事實、講道理，並透露了不少鮮有人知的軼事。我們相信，這樣的對話，對研究郁達夫和王映霞的問題是十分有益的。

——編者